

晚清知識份子引介西洋史的若干問題

——以梁啓超史學思想爲中心

林正珍

一、前言

一九八二年夏，當中國及南北韓政府抗議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檢定時，日本文部省一位西洋史家辯稱：「日本的史學係受西歐的影響，每以美麗的文字記述鴉片戰後列強的中國政策，若把日本的行爲當作侵略，那麼列強的行爲也應該是侵略，果真如此，高中歷史教科書將充滿侵略。」（註一）如果上述說詞只單純是日本當局及欠缺學術真誠的御用史家抹殺戰爭罪行的意圖，則事實證據的提出將很容易予以反駁，並適度地滿足「被侵略者」傾洩的心理；但是若不願意輕易放過值得思考的問題，那麼這似乎也提供了學術界進一步省思的機會。

設若以前述爲思考起點，則回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日本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實質入侵中土，以及甲午戰後日本在思想及文化上對中國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等事實，日本史學既受西歐影響，那麼前述「以美麗的文字記述鴉片戰後列強的中國政策」是否即近代西方列強向外擴張背後所潛藏的某種意識型態的作用？日本在此文化交流上扮演何種角色？而國人在前述基礎上所引介的西洋史將呈現何種面貌？它將如何架構近代以降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

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欽定學堂」章程的頒佈是近代中國新學制的開端，也象徵了對西方價值體系一定程度的接納與學習，而就在這個學制之下正式開設了萬國史（即西洋史）課程；次年進一步修訂成立的「奏定學堂章程」可視爲是晚清從事新式教育以來最完備的學制綱領，也是民國前推行西洋史教育最積極、最具體的教育法令。（註二）然而在此之前中西雙方早有接觸，其過程雖不必遠溯元朝或明清之際，至少自鴉片戰爭前後歷「奏定學堂章程」的頒佈

以迄清亡，知識份子對西方世界除接受層面日漸寬廣外，在認識觀點上亦有實質變化，甚至可以說在這個階段認識觀點的變遷，不僅顯示在新學制中對西洋史課程的重視與安排上，更直接影響並使得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重新架構了新的世界圖像；因此回溯並評價此學制之前重要啟蒙人物引介西洋史的過程實為重要關鍵。而這將不僅僅是項思想史的研究課題，也關涉了歷史教學的問題，因為這一階段的世界認識透過教學與傳播，型塑了下一代人的世界觀。

而擔負此種媒介功能的途徑與人物相當多，鴉片戰爭前後及其以降，即有部份有識之士對西方應用技術、輿地圖誌及各國民情有所介紹，然而大量並且自覺地擔負此溝通中西世界的諸人物中，仍以梁啟超最為重要。梁氏除自承對歷史這門學科具特殊喜好外，也留下衆多歷史著作，其中有關西洋歷史的譯介，更佔據相當份量；此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時務報》、《湘學新報》、《湘報類纂》、《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清末重要改革派期刊，甚至小說，梁啟超將意念以動人文筆凝聚為輿論對廣大知識份子所傳達的訊息，對轉型期中中國「新知識份子」的型塑具莫大影響力，尤其是對本文關懷所在的世界史認識具備了決定性力量，受其影響的知識青年實難勝數，例如胡適、顧頡剛、蔣夢麟、郭沫若……等均曾撰文敘述受梁氏影響的心路歷程，如蔣夢麟在《西潮》中所言：

梁啟超在東京出版的《新民叢報》是份綜合性的刊物，內容從短篇小說到形而上學，無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學常識、有歷史、有政治論著、有自傳、有文學作品。梁氏簡潔的文筆深入淺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穎或困難的問題。當時正需要介紹西方觀念到中國，梁氏深入淺出的才能尤其顯得重要。梁啟超的文筆簡明、有力、流暢，學生們讀來裨益非淺，我就是千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我認為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介紹現代知識給年輕一代的工作上，其貢獻較同時代的任何人為大。他的《新民叢報》是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註三）

本文即擬以梁啟超史學思想中所反映的世界史構成方法為個案研究，除概述晚清以降西洋史研究中在土流的流行風貌外，並究明晚清西洋史研究在當時學術文化界所具功能、性質及影響，而將全文放置在「歐洲中心史觀」的省察中。

一、晚清知識份子引介西洋史的重點

明清之際，經由耶穌會士的努力，除天文曆象、算學物理及部份應用技藝外，一些輿地之學如《萬國圖誌》也的確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使知道五洲、五帶，但是畢竟局限在極少數的個人，且未賦予「五洲」實質的認識意義。此外，在思想方面，部份的哲學議題也稍有涉及，甚至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名理探）都有中文譯本，但是整體而言，對於思想界的影響極小，雖然清初時期耶穌會士牽扯入宮庭政爭，但是即使是在上層士大夫之間也未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也因此這般「西流」會隨著清初的禁教而瀕於中止；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新教徒和活躍的商人才又扮演起更積極的角色，也為中西世界在近代的接觸拉開新的序幕。（註四）

而回溯晚清中西世界再接觸以來，知識份子對西方國家歷史的認識，在質量上是與西方衝擊的程度相並進，其過程與政治史上慣常運用的鴉片戰爭、自強運動、甲午戰爭、維新變法和立憲運動等階段分期，也有相一致之處。其特色是隨外力衝擊的程度，由早期附屬在歐洲各國地誌的情況，進而在有關政制與法律的討論中漸被認為與中國殊異的邦國而逐漸獨立，後遂有專門以萬國史為名的書籍，當然絕不可誇張這項成果，因為即使是在清末新學制確立後，在京師大學堂及各級中西學堂，對西洋史的介紹，不管是通史或國別史均停留在粗淺的介紹上，其中絕大部份是譯自日文書籍，甚至京師大學堂的萬國史教習即由日人服部宇之吉担任。就整體而言，直到清亡，仍談不上專業研究的水平，但是回溯這一認知過程仍有助釐清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世界秩序觀」（Th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形成的軌跡。

十九世紀第一位來華的著名新教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其後迭有跟進者，如麥都思（W. H. Medhurst）、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衛廉士（S. W. Williams）、伯駕（P. Parker）、合信（B. Hobson）……等，他們大都懷抱著強烈的傳道熱誠，也具備相當的學識條件，但是直到鴉片戰後沿海開港較順利推展其活動據點之前，他們的成就大抵仍相當有限，即使在廣州及澳門的活動都有困難，馬禮遜只好在滿刺加（Malacca）創立「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並於當地刊行《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21）。其後，麥都思刊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1828—9），郭士立主編《東西洋每月統計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3—7）。鴉片戰後沿海開港，定期刊物也隨之增加並隨其活動範圍的擴大而傳播，如麥都思、奚禮爾（C. B. Hillier）、理雅各（James

Legge)先後主辦的《遐爾賁珍》(Chinese Serial)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刊行於香港，瑪高溫(D. J. Maegowan)主辦的《中外新報》(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於一八五四年刊行於寧波，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主辦的《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刊行於上海，麥嘉湖(John Macgowan)的《中外雜誌》(Shanghai Miscellany)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刊行於上海，查美司(Chalmers)的《中外新聞七日錄》(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刊行於廣州等，凡此刊物均以通中外之情為主，述西方近況爲目的，文字的性質，以科學、天算、輿地、文學、宗教及新聞爲主，對西方世界則偏重在現世實況的報導，不少中國學人由此獲得新知與啓示(註五)也對此異邦的歷史漸增興趣，如粵東學人梁挺枏除纂修《粵海關志》、《廣東海防彙覽》、《粵道貢圖說》六卷外，並撰有《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一卷、《蘭倫(英國)偶說》四卷及《合衆國說》四卷。這是近代有關中西關係及介紹西方事物的較早書籍，其後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林則徐遣人翻譯的《四州誌》……等，均爲同類書籍的著名代表。除此私家事業外，凜於船堅砲利的事實，先後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建船政學堂、南北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官方機構的成立，除仿學西方技藝外，也翻譯了爲數頗豐的洋書，雖然仍以技藝爲重，但是對當時知識份子具一定程度的啓蒙作用，也因此在這個時期較具遠見的知識份子似乎都有著相同的「初識西學」經驗，如康有爲在自編年譜中記錄了這段變遷過程：

於時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爲志，則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緯畫之，俛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口環遊地球及西書數種覽之，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誌、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註六)

又如梁啓超自述其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北京會試落弟歸經上海，始見徐繼畲《瀛環志略》一書及上海譯書局所譯西書，而眼界大開。(註七)光緒十八年，梁啓超在其「讀書分月課程」一文中不僅開列了《萬國史記》、《瀛環志略》、《列國歲計政要》、《格致須知》、《西國近事彙編》、《談天》、《地學淺識》等爲西學書目外，並建議讀書

的先後次序：

讀西書先讀萬國史記以知其沿革，次讀瀛環志略以審其形勢，讀列國歲計政要以知其富強之原，讀西國近事彙編以知其近日之局，至於格致各藝，自有專門，此爲初學說法，不瑣及矣。（註八）

凡此大概是一位初識西學者在現有環境內所能得到的西學內容。而總括同光年間歷史方面的書籍，最早有馬禮遜的《外國史略》，其後則有艾約瑟的《歐洲史略》、趙如光及謝衛樓的《萬國通鑑》、李提摩太的《萬國通史》、日人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而以山西大學堂所出邁爾的《通史》最爲流行。通史及專史方面則有艾約瑟的《希臘志略》及《羅馬志略》、同文館所出《俄國史》、徐景羅闕斐迪的《俄史輯譯》、日人岡千仞的《美利堅志》、王韜的《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徐建寅的《德國合盟本末》、沈敦和的《英法俄德四國志略》，而以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慕維廉所譯《大英國志》最爲著名。（註九）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五）甲午戰敗，對中國而言，不僅引發政治上的變法維新事件，相對應此事件的是意識型態的變遷所顯示出對西方政制與法律的廣泛興趣上，此後維新報業、新式學校與研究性社團成爲傳播近代政治自覺的強力媒介，且三者相互援引，不僅開展了新知識份子的文化視野，也昇高政治活動的激烈性，如改革派所發行的系列期刊對西方政制、法律乃至歷史的譯介，而此時嚴富也開始有系統的譯介達爾文的《物種源起》（*Origin of species*），次年又翻譯赫胥黎（T. H. Huxley, 1825—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而戰敗的羞辱更強烈刺激一般知識份子，使得在民族危機的對顯下由民族競爭的層面來理解達爾文的學說。甲午戰敗及其後日俄戰爭的事實，更使晚清知識份子肯定日本吸收西學的宏效，是立憲政體打敗專制政體的明證，即本此信念，而開始以日本爲中介大量吸收西方文化，除大量介紹西方政制與法律外，也引進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其性質可以甲午戰爭爆發後不久，廣學會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蔡爾康所譯麥肯次（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攬要》（*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最足以說明其特色。《泰西新史攬要》是一本介紹十九世紀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書中盛讚西方科學成就，中譯本銷行很廣，除廣學會版本外且有私自翻印者，總計當在百萬冊以上。（註十），李氏在序言中大聲疾呼：

什麼是中國在最近六十年來蒙受外國戰爭、賠款和反覆侮辱的原因呢？……上帝正通過鐵路、輪船和無線電削弱各國民族間的防禦，以便大家作爲一個家庭的兄弟生活在和平與幸福之中。（註十一）

無疑的，現代西方科技文明所展現的實力是國人認爲在近代中西接觸以來使中國蒙羞的主要原因，而這樣一部介紹西方何以能臻富強之境的歷史在甲午戰爭之際出版，當然會大受歡迎，而刺激之深自是無與倫比。也正是在一九八四年夏天，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直隸總督李鴻章，條陳改革，留下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名句。（註十二）此外，由前述清末五種改革派期刊（《時務報》、《湘學新報》、《湘報類纂》、《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抽樣而觀，更有相契合之處。在這些刊物裏，除以相當多的篇幅刊載國內外時局現況外，有關西方學說或歷史的介紹也佔據相當份量；不論是撰作或翻譯，分析歸納其內容則可見出當時知識份子旨趣之所在。在空間方面，敘述重點在英、法、德、俄、美等十九世紀新興的民族強國，或是與之相對顯，無力應付強權挑戰的衰敗弱國，如埃及。在時間方面，對近代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以後的西方歷史爲介紹的重點，並以此脈絡爲準，賦予「文藝復興」以降西方歷史特殊意義；在專題方面，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十九世紀外交史、明治政黨小史爲其介紹重點；而在人物傳記方面則偏重華盛頓、俾斯麥、彼得大帝、納爾遜……等近代人物；而在思想學說方面，除達爾文學說外，則有亞當·斯密斯的國富論、霍布斯學案、盧梭學案等。（註十三）由上述粗略的歸納可知當時知識份子引介西方的重點在「近代民族強國」之形成和所以成及特定使達成此目的標人物。

這種大量新鮮知識的引介的確大大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然似乎隨著所介紹內涵也引進了某種特定思維，例如郭沫若在其《少年時代》一書中回憶這段心路歷程：

《清議報》很容易看得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却表現得很有有一種新的氣象。那時候，梁任公已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裏很鄙屑他，但却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崙、俾士麥之餘，便是崇拜加富爾、加里波底、馬志尼了。（註十四）

如此，一些西洋史上的關鍵人物逐漸佔據了中國人的心靈，就如梁任公本人於光緒廿三年（一八九七）主持時務學

堂時，在批閱學生割記裏即充份流露出他對美國及其國父華盛頓的極端推崇，他稱華盛頓為「王」（德治的君主），那是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在中國唯有最賢明的君主可當此號。（註十五）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梁氏甚至用「少年中國」這個觀念，試圖動員中國人以建立現代國家，而其靈感則來自義大利三傑的合傳，而梁氏本人也常常以東方的馬志尼自居，雖然未必妥當。（註十六）而根據此一特定路線，似乎中國歷史上某些特定議題或人物也逐漸取代舊有的歷史地位，而躍居歷史舞臺中心而被大加讚揚了，如墨子、管子、趙武靈王、張騫、班超……等。

(表一)

學堂及學科 學門名稱	西洋史及其 相關科目	科目 性質	每星期鐘點			總計 時數	佔總 比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大學堂文科大學	中國史學門	1.世界史	1	1	1	3	12.5	
		2.西國科學史	"	1	1	1	3	12.5
		△外國語文(英、俄、法、德、日選習其一)	"	6	6	6	18	75
中國文學門	1.世界史	"	1	0	0	1	4.1	
	2.西國文學史	"	0	1	2	3	12.5	
	3.外國科學史	"	1	1	2	4	16.7	
中國文學門	△外國語文(英、俄、法、德、日選習其一)	補助課	6	6	6	18	75	
	4.西國法制史	隨意科目	不詳					
	△臘丁語，希臘語	"	不詳					
英國文學門	1.英國近世文學史	補助課	3	2	2	7	29.2	
德國文學門	2.英國史	"	2	2	1	5	20.8	
法國文學門	(中國文學)	"	3	3	5	11	45.8	
俄國文學門	△臘丁語	"	3	3	2	7	29.2	
日本國文學門	3.外國古代文學史	隨意科目						
	△希臘、意大利、荷蘭、法、德、俄、日語	"	不詳					

而前述意願與實質影響也在清季新學制的改革時正式具體化，如由「壬寅學制」及「奏定學堂章程」精神下設立的京師大學堂對西洋史課程的安排與重視可見出端倪：（註十七）

（表二）

類別	外國史 科目名稱	每週時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仕學館 史學門	外國史典章制度		3		
	考中外治亂興衰之故			3	
師範 中外史學門	外國上世史、中世史	2			
	外國近世史			2	
師範 館	外國近世史並歷史教學法				2

（表三）

科目	內容	修業年次	該學科每週總時數	該學年每週時數	%
史學	世界史	第一年	5	24	20.8
史學	泰西近時政治史	第二年	2	24	8.3
商政	世界商業史	第三年	2	24	8.3
兵政	近世戰史略		2		8.3
	總計		11.	72	15.2

(表 四)

萬國史學門科目		每星期鐘點			總計	佔總時數 (%) 比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一) 主 課	史學研究法	2	3	4	9	12.5
	泰西各國史	6	6	6	18	25
	亞洲各國史	3	2	2	7	9.7
	西國外交史	2	2	0	4	5.6
	年代學	1	0	0	1	1.4
(二) 補 助 課	卸批歷代通鑑輯覽	2	2	2	6	8.3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史	0	1	2	3	4.2
	萬國地理	2	2	2	6	8.3
	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 選習其一)	6	6	6	18	25
	合計	24	24	24	72	
(三) 隨 意 科 目	1.學藝類：中國文學、辨學、人類學、金石文字學。 2.經世類：教育學、公益學、國家財政學、人民財用學、 交涉學、法學原理。 3.外國專史類：外國法制史、外國科學史。					

由前述諸表可知西洋史課程的份量，而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史斷代劃分法也正式在教學上被運用，而國別史與語文訓練均側重在英、法、德、俄、日等國，尤其是在中國史學門及中國文學門中，每學年均開設「西國科學史」尤其特色。而根據所能得到的文獻資料，京師大學堂中萬國史講義的編纂者是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而其萬國史講義首先討論萬國史的釋義、開卷時間、分期等問題。原講義共分四章：第一章「埃及與亞細亞諸國之關係」，第二章「希伯來族全盛時代」，第三章「亞西里亞帝國：四大強國崛起」，第四章「希臘國發達概略」。（註十八）

服部宇之吉的《萬國史講義》雖僅敘述到希臘，但仍有其脈絡可尋，因為明治初年開始盛行的自由民權思想是以歐洲史作為一種線索而發展，其所要闡明的宗旨是以資本主義所推動的近代西洋文明，光緒年間盛行於中土的天野為之的《萬國歷史》序文即充份闡明了這種特質：

萬國史是將萬國看成一個社會，並且是以敘述世界全體之發達為目的，故即便是建國於古代而沒有記載價值的國家也有。應該選擇的是歐洲諸國，而應予放棄的是亞洲各國。西洋文明給世界萬國帶來影響，並且具有指揮世界發達的力量；但是亞洲文化，人民對世界整體性的大規模運動並無絲毫關係，只是被捲入西洋文明的風潮之中。為了使日本的國名炫耀於萬國史之中，做為日本的國民，不外是應該促進對世界具有大關係的人民。（註十九）

這是以西洋文明為中心而向外拓殖為主線的一種史觀，而在這史觀裏，天野為之不僅肯定這股潮流的主導性地位，而且以此為號召鼓舞日本加入這股主流裏。而一如前述，現階段對近代中國知識界造成最大影響的是日本思想界及文化界，經由留學、譯書及諸種管道，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成為中國「新」知識份子吸取新知識的重要源泉，例如梁啟超在維新變法失敗而亡命日本後，先後旅居該地達十四年之久，而梁氏就自認為這段時期是使其「思想為之一變」的關鍵時期，（註二十）如此，透過日本為中介，前述史觀也深入當時知識份子心靈，此點由前述對西洋史時空與人物的選取上已見端倪。

於今重新回溯這段「西力」入侵的歷史，近代西方文明以民族主義為動力入侵中國的事實，也逐漸成為激發中國人爭取獨立自主所援引的理論基礎，因為就像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所作的推論：若民族主義能夠推動西方國家富強也必然能夠富強中國。（註二十一）最後中國雖然也終於以民族主義為最大動力走向統一，却也付出相當的代價。形成於西

方近代的民族主義是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的產物，有其賴以形成的文化因素，而這些特定因素也跟隨「西力」滲入中國，並且在民初五四運動時期造成重大衝擊，其影響至今未竭，因此「西力」背後的思想動力才是需要進一步省思並給予重新定位的。

三、梁啓超史學思想中西洋史的角色與功能

若純就思想史的角度評估，梁啓超在中國近代思想上是位重要却不必然偉大的人物，是位影響深遠的政論家而非獨具創見的政治思想家，即使是他最感興趣並在晚年投入最多心力的史學之門，也並未以自己所推崇的所謂「近代科學方法」對中國歷史的某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取得創造性的成果，而這項論斷可以《清代學術概論》中，梁氏對自己及同時期諸師友的一番評價作一輔助說明：

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輩，卽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卽中卽西」之新學派而已爲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根深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澆汲而易竭；其支細滅裂，固宜然矣。……康有爲、梁啓超抱啓蒙時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爲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學不昌，而轉成爲歐西思想之導引。（註二十二）

晚清以降中國的特殊處境，確實使得中國思想界逐漸面對一些共同的課題，而西力的衝擊自是其中的重大因素之一，例如中國如何方能臻至富與強就是梁啓超終其一生的最大關懷所在，而鑑於中國的衰弱，則殷切吸收並介紹西方知識以對應危局。在此前提之下，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形成與其政治理念實具一定程度的關聯。汪榮祖在「梁啓超新史學試論」一文中卽指出：「梁氏之史學思想實與其維新思想相呼應」（註二十三）更精確而言，史學思想是梁啓超經世思想之一環，其重點仍在政治理念上，然而其政治理念的形與發展，則直接與西學的衝擊相對應，因此雖勇於拋却陳說使梁氏主張呈顯了多樣性，但是對應國內政局與西方思潮的影響却是其思想走向的不變歸趨，也因此有關梁啓超政治活動或其思想的研究，大都以「亡日」（一八九八）、「旅美」（一九〇三）和「遊歐」（一九一八）三個關鍵時期作爲其思想形成的斷代劃分。本文大體接受此前提看法，但擬另闢蹊徑，由其所引介西洋史的特質對其思想的全貌有所補充，必

需進一步說明的是有關梁啓超史學思想整合的研究，應該不能忽視其遊歐之後的一些歷史著作，而這猶賴自史學史的角度予以更審慎的評估，將不列入本文的處理範圍。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梁啓超北京會試落第，歸經上海見徐繼畲《瀛環志略》及上海製造局所譯西書而初識西學，同年並識康南海，爲梁啓超一生重大轉捩點，並爲其流亡日本之前的主要思想基礎。梁氏自述這項轉變：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之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註二十四）

陸王心學、史學及西學的融合卽爲梁氏此時期思想之內涵，而前述「讀書分月課程」中所列西書卽爲梁氏現階段所認識的西學範圍。而此後除追隨康有爲開強學會、担任中外公報編輯、撰「變法通議」批評稅政外，此時期思想上的重要見解，在於依循康南海的思想脈絡，將中國歷史的演進納入公羊三世說，並在甲午戰爭前後進化論介紹入中國後對達爾文學說作了某種程度的結合，如其在「春秋夷狄辨序」中所言：

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尙羸角，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昇平，則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今論者持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爲攘諸夏也。（註二十五）

此外，由「說群序」一文則又可見出現階段的梁啓超雖已得識西學，但價值體系仍源出傳統公羊學定義下的世界觀；如文中對「國群」與「天下群」所作的分野：

今夫千萬人羣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羣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群乎哉？……抑吾聞之，有國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群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則猶未也。易曰，見羣龍無首者，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其斯爲天下羣哉！（註二十六）

由上可見梁啓超在此時期所認同的是「天下群」，而甚至認爲西方列強只臻於「國群」之境，隱然有文化優劣之別，不脫清末思想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基調，例如不僅在「長興學記」、「讀書分月課程」、「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及「西學書目表後序」諸文呼籲引進西學的重要，也在所參與的諸種刊物中介紹一些西方人物與學說如華盛頓、俾斯麥、彼得大帝、納爾遜等，並翻譯矢野文雄《徑國美談》政治性小說，然而却在光緒二十二年的「西學書目表後序」警告：「……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爲患，而中學將亡之爲患。……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爲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爲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註二十七）而這一根本態度直到梁任公亡日而使其「思想爲之一變」的旅日初期仍無根本的變遷，如在《東籍月旦》中，他爲國人大量介紹日人所著或翻譯的倫理學、西洋史、東洋史或日本史書籍，但仍在有關世界史的介紹中，宣稱：

日本人所謂世界萬國史者，實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爲彼等所獨有者然；故往往敘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種族，興廢存亡之事，而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歐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併美國、俄國而亦不載，他更無論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矢野爲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序乃至謂東方民族，無可以廁入於世界史中之價值。此在日本，或猶可言，若吾中國，則安能忍此？近年以來，知其謬者漸多，大率別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眞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註二十八）

國勢日急，居東五年，梁啓超除大量吸收日人所引進的西方學說外，而目睹日本國力日盛則愈加企慕中國的統一與強盛，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梁氏提出了數量龐雜的相關著作，除政治性文章外有：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說、新史學、釋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中國地理大勢論、格致學沿革考略、三十自述、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說、論希臘古代學術、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天演論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論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趙武靈王傳、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新羅馬傳奇和俠情記……。（註二十九）

誠如李澤厚所言：「這是一張相當複雜的書單，却居然出自梁一人一年之手」，而列文生（Joseph Levenson）如此形容這時期的梁啓超：

在這些年裏，梁啓超最關心的是他在橫濱出版的新的雙月刊《新民叢報》（按：應為半月刊）。每期大約四十頁，刊載創作、時事評論和關於中國過去及將來諸多文化問題的論文。全部西方思想似乎都在梁啓超的視野之中。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美觀而浮淺的陳列，他自由地漫步在從蘇格拉底的片斷到《純粹理性批判》中。他評論了從亞歷山大到拿破崙這些將官們，也沒有忘記格斯道佛·阿道弗斯。如果年輕的學生想了解古代與近代歐洲的情況，那麼《新民叢報》會為他提供詳細的書目。（註三十）

事實上複雜或繁多的僅在數量上，本質則無非是對「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的高度關注，就在同年（一九〇二），梁氏在其《新民說》中正式倡導民族主義，並且認為這是近代西方列強賴以強大的思想動力：

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註三十一）

梁氏進一步指出這種民族主義後來演變成民族帝國主義，造成歐洲各國向外擴張和互相競爭的情況，而中國不幸地成為他們擴張和侵略的對象，因此梁氏認為若要抵擋列強的民族帝國主義，則「唯有行我民族主義一策」（註三十二）如此，從認識西方的船堅砲利，到認識西方制度的優越性，然後深深體會出中國數千年的王朝體制與西方現代國家體制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是清季知識份子認識西方的一段逐漸深化過程，而梁啓超在體會到這個差別之後，深知中國唯有轉換成現代國家才具備與列強競爭的能力，於是在這個覺醒之下，梁氏提出了民族主義，（註三十三）並透過一切途徑激發國人認同這一新的民族共同體，如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甚至呼籲政治小說的撰寫以激發民族情操，他本人也創作了流露出明顯政治宣傳意圖的《新中國未來記》，更重要的是在學術思想上，他選擇了更新史學的精神來達到此一目的。同樣是在一九〇二年另一篇與《新民說》同等重要並在近代中國史學史上具重要地位的文獻資料——《新史學》即充份反應了這種精神，梁氏在卷頭語上即開宗明義地確立了史學與民族主義並及文明的

關係，希望藉史學激發愛國心以對抗帝國主義：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惟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註三十四）

梁氏並於同年的「三十自述」一文中言：「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註三十五）雖然這一理想終未實現，但事實上，《新史學》可說是他草創中國通史的理论基礎，而早一年所發表的《中國史敘論》則可視為是其撰述大綱，而其主旨仍不脫藉助歷史助長愛國思想，其中復沿用西洋史之例重新區分國史之時代：

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民族交涉繁頤競爭最烈之時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註三十六）

然而，回到梁啓超對民族主義所欲達成的「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目標，由此仍可見出近代民族主義發展途中與民權及民生共生的現象，而這樣的理想是奠定在一種基本預設上：一個築基在憲法的共和體制必然是以民族主義為其思想動力，而這樣的國家也必然是富與強的；於是在梁啓超的筆下也出現了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培根、笛卡爾、孟德斯鳩、邊沁、康德……等的介紹，甚至追溯這些思想家思想所源出的古典時代，因為梁啓超認為共和民主的根源在希臘和羅馬時代，而最重要的突破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英、美、法等諸國的重要思想家。

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一月梁啓超遊歷美洲，十月重返日本並發表了《新大陸遊記》，研究者均認為此番遊歷因鑑於工業文明的禍害及西方帝國主義的侵凌，使梁啓超完全拋棄了早期狹義的「小民族主義」而強調國家目標的至高無上，使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終告確立，而梁氏認為中國目前最急切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存亡的問題，因此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種族革命。由此可見出梁氏思想與當時革命派的分野，他並提出「國民主義」來標示其政治革命的眞諦：

夫國民主義，則政治革命之立腳點也，民族主義，則種族革命論之立腳點也。吾認國民主義為國家成立維持之必要，故主張政治革命論。吾認民族主義為國家成立維持之必要，故排斥種族革命。吾以為若從國家之成立維持一

問題著想，則民族主義，贅尤已耳。（註三十七）

此後梁氏放棄排滿的小民族主義主張，改以「國民主義」的追求以確立整體中國之富強；而事實上，梁啓超此一「國民主義」的用詞更與其史學思想相表裏，如主張「史當爲國民而作」，其目的在於完成政治革命以對抗帝國主義。與此相對應的是梁啓超對伯倫知理（Johann K. Bluntschli, 1808—81）國家有機體說的提倡，以國家整體利益爲出發點而駁斥盧梭的自由民權學說，因爲他認爲世界政治潮流既已趨向民族帝國主義，則個人自由的政治哲學亦爲既陳芻狗，失其效用，（註三十八）而這也是梁氏提倡開明專制取代原先的共和立憲的理論根據所在。

此後梁啓超對中國現實政治的進言雖仍有所變，而民族國家的觀念則未再改變。如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他仍堅持當人們在潛意識上把整個世界看成是單一國家時，就不可能擁有統一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而這是梁啓超從中國和古羅馬的比較中得出的一個結論：

我國人愛國心之久不發達，則世界主義爲之梗也。吉朋者，英國之良史也，所著羅馬興亡史，歐洲有井水飲處匪不誦之，其言曰：羅馬自征服意大利以後，其人民無復愛國心，彼非不愛羅馬，然所愛者，羅馬之文化，非愛羅馬人，非愛羅馬國也。其人常以保存增長其文化爲己任，無論何族之人，有能完成責任者，則羅馬人奉權力以予之不稍吝，故羅馬歷代帝王，起於異族者居其中。（註三十九）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梁啓超偕同蔣百里、張君勱、劉子楷、丁在君和徐新六等人赴歐洲考察，一九二〇年歸國後，自此放棄上層政治活動轉而全力從事培植國家基礎的教育事業。這個階段是梁氏思想最爲成熟的時期，而其個人的重要著作也在此時接續出版，如《清代學術概論》（一九二〇）、《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九二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九二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九二六），此外梁氏並於一九二一年與其子共同翻譯韋爾斯的世界史綱。經過歐戰洗禮及承受德國歷史主義思潮的影響，（註四十）而重新以「精神」和「物質」二分法區別東西方思想的差異，並對中國史學方法有所進言，但是其對西洋史的根本看法仍未改變，這點除由德國歷史主義的本質帶有強烈德意志民族色彩可證明外，民國九年他爲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所寫序文亦可見出：

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果爾，吾前清一代，亦庶類之。……其論歐洲文藝復興與所得之結果二：「一曰人

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發現於此二者耶？夫「世界」則自有世界以來而即存在者也，「人」則自有人以來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爲歐人於文藝復興後始發現之，則前乎此未嘗發現也；而他族之未經「文藝復興的」之磨鍊解放者，皆其未嘗發現也。……吾儕處漫漫長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饑渴等於百里者，不知凡幾也。（註四十一）

以文藝復興作爲西方世界近世史的開端，除斷代分期的便利外更是某種特殊思維模式下的產物，不僅有「前近代」與「近代」的價值區分，更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在全世界擴張的某種特殊取向的世界觀的原動力，晚清的特殊處境使得知識份子或迎或拒均不免要面對這一西力衝擊，在這個前提之下，西洋史在梁啓超的思想體系內扮演著極特殊也極特定的角色，除認識的需要外，對於民族國家的高度認同，使得西洋史在梁氏思想中成爲凝聚國家主義的重要工具；換言之，透過介紹西方列強之所以興起的歷史解釋鼓舞國人民族意識以臻富強之境，也就是這項強烈要求使得晚清思想界會將達爾文主義單純化爲「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簡單理念，甚至從民族競爭的層面來理解達爾文主義，而在非常時期如國家危急時，更被用來攻擊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梁氏的這種思想傾向在晚清並非特例，由前述新學制中西洋史課程的安排可知，而這個認知並未隨民國的締造而終止，甚至在新文化運動後造成更龐大的西化風潮，至今未歇。

四、歐洲中心史觀的省思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的變局可視爲是在西方列強的全球性擴張中，中國被納入世界體系之過程，其中相關的插曲是東鄰的日本自甲午戰後更加快速、激烈的推動這項過程。而民族主義正是西方列強得以從事全球性擴張的重要動力；事實上，西方列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國家體制，並且以國家爲單元展開全球性的競爭，西方諸國不但把整個地球當作競技場、並且還規定參加競爭的資格（現代國家）、競技規則（武力、外交及符合強權政治的國際法），以及勝負標準（殖民地、原料、市場）。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不願意接受「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命運，那就必需取得競技資格——建立一個現代國家。（註四十二）

梁啓超不僅深切體認到民族主義是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必備的根本精神，更提出一切達到此目標的可能管道，如借用

歷史、宗教甚至小說。因此晚清以降西洋史的引介與教育實際上發揮了相當程度激發民族主義的功能，然而這又如何達到呢？明治時期日本史學界的發展清晰地勾勒出這段歷程，而深受影響的晚清學界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誠如前述日本史家所言日本史學係受西歐影響，而明治初年開始盛行的自由民權思想是以歐洲史作為一種線索而發展，吉田悟郎即認為日本的西洋史教育與研究，係借用十九世紀西歐的歷史學和歷史教育之方法及主題，初期是吸收十九世紀西歐的歷史學及英法的史學；不久，則代之以接受德國史學為主，而其西洋史的整體結構是肯定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及發展是人類發展的目標，而這一發展過程是由探討日本、德意志、義大利……等國如何完成近代民族國家之課題作為出發點，追溯希臘、羅馬乃至古東方遙遠的過去，作為近代強國的西洋諸國之所以形成及發展為強國的指標，由是而構成具有意義的歷史結構。（註四十三）因此在這個指標之下，一部西洋通史所要探索的重要主題，就依如下情節而展開：

以西歐為中心的先史時代，由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至阿克美尼期王朝（Achaemenid Dynasty）的波斯帝國——其中奠定希伯來文化之基礎——以古東方史作為西洋史的前史。由愛琴文明至希臘化世界的擴大之古希臘史，由羅繆拉斯（Romulus）傳說至「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古羅馬史——希臘、羅馬史被視為西洋文明的「古典古代」——由此而結束「古代」。接著，進入「中世」。內容包含日耳曼民族的遷移、日耳曼諸國及法蘭克王國的發展、查理曼帝國及其分裂、德、法、英等西歐國家的政治及社會體制之封建制度、羅馬公教的发展、教皇權的確立及其與王權之抗爭、都市的發展，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以及略述回教、東羅馬帝國的歷史等。「近世」則由敘述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地理大發現等開始，進而談及宗教戰爭、所謂絕對主義國家（專制王權）的發展、英、法、德（普、奧）、俄等國的發展與對抗、西歐各國的殖民活動和殖民地爭奪戰等。接著到了英國的兩次革命，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時代等所謂「市民革命」時代，而進入十九世紀的歷史。開始於維也納會議的十九世紀西洋史，乃是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大運動及其勝利為中心，另一方面兼述及產業革命的展開、中產階級文化及社會主義運動，以及英、法、普（德）、奧、義、俄、美等國的發展。而一八八〇年代以降的所謂帝國主義時代，主要係敘述西歐列強的世界政策及其對抗，列強在亞非兩洲的殖民統治……。

(註四十四)

如此，以「古代」、「中世」和「近世」作爲斷代區分，不僅止於便利研究的形式意義，其實質的內涵是在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爲中心而展開的歷史陳述，這個西洋史結構背後有其運作的意理基礎，那是種信念！相信現代的歐洲民衆是經歷了「十八世紀的意義」而全部開明化，亦即宣稱近代歐洲社會主要是由受過近代理性主義洗禮的中產階級所組成，而其理想主要在貫徹法國大革命所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理念及社會理想；換言之，深信他們所處的時代已去除了「前近代」的屬性。不僅如此，更深信十九世紀以降西歐文明是近代化及文明化的唯一而絕對的典範，而這個意識型態正是十九世紀西歐列強向外拓殖的主要理念。試看東方的日本在明治時代除前述天野爲之外，福澤諭吉如何宣揚這一「以西洋爲目標」的理念，並在其後的世代裏成爲合理化侵略中國的心理依據。在《文明論概略》中，福澤諭吉明確地表示，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可以通過開化程度的高低來進行橫向的比較，人們可以通過這一比較來發現孰優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長短、輕重、是非、善惡都是相對的一樣，世界上各種文明的開化程度也是相對的。於是他以「文明開化的相對性」這一概念作爲分類的標準，把當時的歐洲各國與美國判識爲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把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判識爲半文明國家；把非洲、澳洲地區的一些國家判識爲野蠻國家。這樣，就把當時世界上各自獨立發展的民族文明，分別歸類到由低到高排列的作爲「人類必經的階段」的文明發展序列之中。這種序列分類的結果，使多元化的文明可以用進化程度這一尺度進行橫向的比較，從而在總體上確立了處於「半文明」類型的日本，必須以西洋各國的更先進、更發達的近代文明作爲自己全面效仿榜樣的結論，因此福澤諭吉對日本民族對應西方挑戰這一課題作出如下的選擇：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還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爲目標，確定它爲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註四十五）

再試看中國近代史的歷程：

簡言之，中國近代史記錄下兩套劇本——其一爲存在於伴隨著擴張的西方文明而來的國際貿易和戰爭，以及與其相抗衡的農業的、官僚的中國文明二者之間的文化對立。其二爲在此一文化對立下所孕育的前所未有的革命風潮，造成中國全面地變遷。

上述的衝突和變遷的過程，無論其起因於中國及外在世界的對立，或中國本身新舊交替所致的矛盾，於衆多的史家論述及史料的記載中，觀點均不盡相同。對西方史家而言，顯然一種維多利亞式的世界觀（The Victorian View of the World）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英國、法國和美國等擴張主義建立了不平等條約體系。他們篤信民族國家、法治、個人權益、基督教及科技，以及經由戰爭可攫取更大的利益。（註四十六）

與「維多利亞世界觀」相依存的是十九世紀以降歐美史學界所盛行的進步史觀，兩相結合，使具特殊詮釋意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遂成爲國家主義的核心，而其所型塑的「西洋史」也成爲近代西歐列強與中國在近代接觸的背後動力；她一方面合理化「弱肉強食」的侵略事實，相對的在其擴張下的亞非國家則在此挑戰之下遂起而追求前述西方列強所具備的「文明」內涵。這也就是何以麥肯次的《泰西新史攬要》在甲午戰爭前後出版時，會迅速銷售達百萬冊的重大理由，因爲麥肯次正是西方史學界進步史觀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泰西新史攬要》中，麥肯次宣稱：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進步的歷史——知識增加、智慧長進、智力與福祉逐步上升到較高的地步，每一時代的人把他們所承繼的寶藏遺傳給下一代……進步的程度有快有慢，有時甚至顯得急躁不安……但是停滯不前只是表相……十九世紀的進步是空前的，因爲它推翻了一切阻撓進步的障礙……自由使這些力量得以發揮它的潛力。而人類福祉的增進，從此獲得了上天法則的領導。（註四十七）

這種樂觀心態是隨著現代科學精神的萌芽而成長的，理智使得科學家在自然界找到了因果運作的普遍法則，於是哲學家也殷切地希望能通過理智歸納出人類心智發展的普遍法則，他們以爲人性是一種穩定而持久的具體事物，是歷史變化和人類活動的永恒基礎；歷史雖不重演，人性却永不變更，因此只要理智能使人對人性的了解日漸增加，則每一項進展均會解決目前的困境，而人類生活也將走向一個可規劃、可預期的黃金時代。（註四十八）

這種主要在於視歷史爲人類理性展現的舞台的信念，很容易使他們將十九世紀的西歐文明視爲是近代化及文明化的唯一且絕對典範，因此近代西歐強國的成立和發展全然是自律、內發過程的西洋史觀點自然很容易使得「強權」成爲範圍人們的價值觀，於是「近代」和「前近代」的劃分成了價值判斷，而非人類時間之流逝過程的必然。然而由於特殊的時代處境，在西方世界裏「民族」、「民權」、「民生」相共生的觀念叢，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中，至少在近代中國和

日本都造成了不同的發展。就以日本爲例，一如前述，日本明治初年開始盛行的自由民權思想是以歐洲史作爲一種線索而發展，就一般而言，西洋史的教育是在探索共和政治、議會、三權分立等民權的發達過程，對主張自由、平等、民權的重要性之啓蒙思想予以正當的評價，並且具有排斥獨裁政治的態度。然而自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民權運動敗北，明治政府開始積極準備對外的侵略，鼓吹國權思想，提高國家權力之際也走上侵略性的國家主義。

而在近代中國，追求共和理想（民權）工業化（民生）和國家主義（民族）的要求也是相依存的，但是外患的侵陵使得富與強的要求日漸激烈化，導致了近代中國某些特殊趨向，例如在國家主義觀點下認取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將進化論昇高到民族競爭的層次，甚至在非常時期被用來攻擊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以凝聚國家權力。晚清及民國時期都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凸顯並高揚了民族主義。

如果對某一思想的接受必有其相對應的環境，那麼在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狂潮中，晚清以降的知識份子事實上對於「每以美麗的文字記述鴉片戰後列強的中國政策」這一命題實未具備多少反省能力；這充份證明了認知過程的關鍵絕非資訊的累積而在思想的創新，因爲隨思想的突破所帶來的將是視野開擴與境界提昇的問題。

五、結論

放眼世界具備世界史的視野是正確而必需的，但是懸以某種特定法則爲定理定律，並且認爲是人類歷史必然前進的規律，則大有商榷的餘地。人之所以有躍離自我中心的意願，在於企求更高層次的提昇，以期認知並包容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相對的有限性（finitude），如此則不同文化系統的人不僅能自覺並尊重自我的時空性和主觀性，同時也能意識並尊重他人自我的時空性與主觀性。（註四十九）當然更重要的是認知「相對」意不在證明矛盾，而是一種「求全」。因此如果能認知「中國史是屬於世界的，不僅因爲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主題，更因爲需要和理當如此」（註五十）在如此視野和胸襟之下的世界史才有契近真理的可能性吧！

以梁啓超爲代表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將目光轉向西方，不僅探討了一些舊傳統中所沒有或未嘗著重探討過的問題，從而對近代中國思想具一定程度的貢獻，而且他們也快速並大量的爲國人敞開另一新鮮而奔放的西方新世界，但是他們

却因客觀環境或個自先天內在的特性使其思想難以克服兩項弱點：其一是過度激情使他們將一切思想內涵予以政治化，這點由他們引介西洋史的重點和說明尤可見出；其二是他們基本上拋開了中國思想的傳統，而這兩項弱點使得他們在思想層面絕少有真正的突破，而在視野上也大受限制，因此儘管引介了大量的西方事物，也將一些西方理論和中國思想放在一起比較，但是在其理論中，學習西方和繼承民族傳統這兩方面，實質上始終是分裂而未能達到辯證的統一，甚至在絕大方面是以所預設的西方價值系統以尋求中國得以符合的管道，那麼民初的全盤西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歸趨了。

如果西方的興起與全球性的擴張是近代世界的主流，而「弱肉強食」雖是大自然的現象却非應然與當然之理，那麼就晚清以降的全體中國人而言該如何面對「西方衝擊」這個課題？民國三十九年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中的素樸講法似乎更加貼切：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註五十一）

任何時代均有它特定的時代課題，就像先秦時代的禮壞樂崩，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的傳入，「西力衝擊」也只是相同的時代挑戰課題，回應成功是指對應時代、適應環境——近代化——的成功，絕非「西化」的事實；如果是後者，那麼近百年來中國的命運豈非在合理化西方列強的侵略活動，而成爲「近代西方文明社會」征服「前進代社會」的例證？

路特·威廉在其《文明與野蠻》一書中，記載了太平洋上的一處孤島，那兒曾經生活著一個完全與世隔絕堪稱文化上最落後的民族——塔思曼尼亞人。他們自古以來就居住在石頭搭成的障壁旁，他們從來沒有萌發過建造草房可以避寒的念頭，他們不知道陶器爲何物，他們的打製石器，也決不比三萬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更爲高明。一八七七年，當最後一個塔思曼尼亞人死去時，這個文化停滯的民族也就從此絕滅了。導致這個不幸民族絕亡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無法從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其他民族創造的智慧成果，以便適應大自然的嚴峻挑戰——他們從來不曾指望海平線上會出現另一個文化給他們帶來新的文化信息。（註五十二）如果說塔思曼尼亞人的文化停滯和最終滅亡，是因爲他們面臨著自身無

法跨越的地理障礙，那麼中國人在近代所面臨的是什麼？就這個角度思考，「西力衝擊」是項挑戰，也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再次重整與進步的福音。

本文對晚清以降知識份子引介西洋史所衍生的諸種問題並未提供解決良方，甚至未提出一套新的世界史構成方法，而所希望的無非是期望思考問題態度的轉換能帶來新視野，新景觀。

註釋

- 註一：吉田悟郎，「日本的西洋史教育」，吳文星譯，《史學評論》，第八期，頁七七。
- 註二：參考《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選舉二，學校下」，頁三一五三—三一七〇。
- 註三：蔣夢麟，《西潮》（台北：自華書店，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頁七十。
- 註四：有關早期新教士在中國創辦學校、刊行報章雜誌及各種學會的概況，及其對晚清知識份子的影響，可詳見郭廷以所著「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書」。以上諸文均收錄入《近代中國變局》（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七十六年）。
- 註五：同上。
- 註六：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頁十一。
- 註七：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文集》第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七年），頁十五—十九。
- 註八：梁啟超，「讀書分月課程」，《飲冰室專集》第五冊（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七年），頁四、頁十一—十五。
- 註九：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頁六八。
- 註一〇：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頁四三。
- 註一一：列文生（Joseph R. Levenson），《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九—二〇。
- 註一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國父全書》第五卷，頁一—十二。
- 註一三：高炳翊、閔斗基編，《清末改革派五種期刊目次綜纂》（韓國漢城大學出版部，一九七七年）。
- 註一四：郭沫若，《少年時代》，轉引自李澤厚，「梁啟超王國維簡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頁四二三。
- 註一五：黃進興，「中國民族主義的特色之一：梁啟超的終極關懷」，《當代》十七期（民國七十六年，九月），頁二四。
- 註一六：同上，頁二九。

註一七：所列四表均轉引自彭小甫，「當前我國大學西洋史教育的剖析：我國各大學西洋史任課教師施教實況及其改革意見調查研究」，〈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六月），頁二四五～七。

註一八：參考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民國五十九年八月），頁七二。

註一九：引自高山博之，「戰前日本中小學的歐洲史教育」，陳豐祥譯，〈史學評論〉第八期，頁九二。

註二〇：梁啓超，〈三十自述〉，頁十九。

註二一：梁啓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第三冊，頁一～一六二。

註二二：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四年），頁一〇〇。

註二三：參考汪榮祖，「梁啓超新史學試論」，〈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一九二。

一九二。

註二四：梁啓超，「三十自述」，頁十六～七。

註二五：梁啓超，「春秋夷狄辨序」，〈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四八。

註二六：梁啓超，「說群序」，〈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四。

註二七：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文集〉第一冊，頁一二六～九。

註二八：梁啓超，「東籍月旦」，〈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九一。

註二九：參考丁在君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六十一年），頁一七二。及〈飲冰室文集〉第一冊目錄。

註三〇：列文生，〈梁啓超與近代中國思想〉，頁七八。

註三一：梁啓超，「新民說」，頁三～四。

註三二：同上，頁四。

註三三：水秉和，「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發展」，〈知識份子〉（一九八七年，夏季號），頁五七。

註三四：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一。

註三五：梁啓超，「三十自述」，頁十九。

註三六：梁啓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十一～二。

註三七：梁啓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飲冰室文集〉第三冊，頁七七～八。

註三八：梁啓超，「新民說」。

註三九：梁啓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飲冰室文集〉第十冊，頁十九。

註四〇：梁啓超即自認這個階段受新康德派哲學里克爾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影響；見其晚期之作：「什麼是文

化」及「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註四一：梁啓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飲冰室文集》第十三冊，頁四三～四。

註四二：參考水永和，「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發展」，頁五七。

註四三：吉田悟郎，「日本的西洋史教育」，頁八一。

註四四：同上，頁八〇～一。

註四五：此處有關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的見解，引自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台北版，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一四～六。

註四六：引自《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導言（台北：南天書局，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註四七：引自柯靈烏（R. G. Collingwood），《歷史的理念》，黃宣範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

一五二。

註四八：林正珍，《柯靈烏史學思想的研究》（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頁一一三～四。

註四九：參考錢新祖，「中國的傳統思想與比較分析的「措詞」（rhetoric）」一文的論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

期，頁一八九～二〇九。

註五〇：《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序的原文是：「中國史是屬於世界的，不僅因為需要和理當如此，同時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主題

」。

註五一：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頁三。

註五二：路特·威廉，《文明與野蠻》（三聯書店，一九八四）；轉引自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頁二〇一～二。